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七三期 ——
(二〇〇七年五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5c)

- 【研究动态】“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浏览偶拾 徐海亮
【书刊评论】见微知著，集腋成裘
—— 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唐少杰
【读书笔记】郑光路的《文革文斗》和《文革武斗》读后感 欧阳龙门
【一家之言】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选载） 周泉纓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动态】

“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浏览偶拾

• 徐海亮 •

终于看到了美籍华人学者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网址是 <http://ccrd.usc.cuhk.edu.hk>）和以此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光盘。该“数据库”在“文革”发动40周年这一时刻完成，编辑者辛勤的劳动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全国学者的支持和心愿也有了归宿，期待已久的读者们更是如愿以偿。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独立研究者，我在2003年就开始使用这个《文库》光盘的第一版（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当时，一看到这个光盘便欣喜若狂，性急之际，不顾学识之陋、方法之俗，立刻“急用先抄、立竿见影”起来，并把几条重要资料自下载、打包转送几个“文革”研究的急需者。近年来，国内“文革”研究中一时无法从官方档案、出版物求证的许多资料均得自《文库》第一版。诚然，那个版本的内容在一些研究者中还有争议（诸如录入错讹、资料出处遗漏、考据不足、重要资料缺失、界面设计问题

等等)，但《文库》的光盘版毕竟一下子拓宽了“文革”研究者的涉猎面和资料占有面，自然也大大推进了本人的研究（以高校学生、武汉“文革”等专题为重心）。令我体会尤深的是，除了得以深入观察自己有兴趣的问题，也能够对“文革”运动的原始全貌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文库》第一版发行后不到3年，“数据库”也问世了。宋先生和他在北美的合作者们（如丁抒教授、周原博士等），在《文库》第一版的基础上努力充实了资料、增订了内容、考证史料、修正错讹，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改善了《文库》的包装技术，扩大库藏、增进功能、便捷查寻。我以为，无论是“文革”参加者和今天的研究者，只要想真正认识和总结这段亿万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历史，都会感谢这个“数据库”的问世。甚至，感谢者似乎还应当包括在九泉之下不可能安息的毛泽东？我想，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后人忘却他自认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过40年之隔，现在的青年人已几乎不知“文革”为何物了；而许多“文革”的当事人则依然不了解大量关键性的“文革”真相。要让后人如实地评说“文革”，这个“数据库”无疑是座文献宝库，而且左、右咸宜。它是历史的实证，而非政治的价值说教。

对比《文库》光盘的第一版和“数据库”，两者在总体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其检索栏包括总目录浏览、主题检索、分部主题检索、日期检索、作者检索和（文献）标题检索，以及全文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但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有了明显的进步。首先，“数据库”增加了一些重要的主题检索纲目，如“突出政治”、“中苏关系和论战”、“四清运动”等。这些内容的增订非常必要。或许有人会问：“这也算文革吗”？其实，中国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从“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广义的“文革”。笔者过去把这些事件称为“前文革”范畴。这些研究资料补入数据库后，无疑有助于增进研究者对“文革”由来和发展的整体认识。从1957年开始（“文革”前十年），中国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市民和已经被打翻在地的旧体制中的残余个人、1957年至1966年在校的大学生（甚至个别思想特别敏感的中学生），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一个广义的、历史过程性的“大文革”运动，卷入了探寻“文革”道路与追随“文革”理念的政治运动，或者说，进入了“文革”的热身过程。现在要研究“文革”，不探讨这“热身的十年”，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十年文革”。

其次，“数据库”增加了“文革”的结束、“文革”后的清查整顿等主题。这些内容对“十年文革”的完整披露和深刻认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文革”的过来人都知道，对“文革”路线与“文革”实践的“拨乱反正”，以及清查剔除“三种人”、提携“第三梯队”，都包含着“文革”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反弹，后者几乎是“文革”历史的直接或间接的延伸。我也把它们看作广义的“文革”，或者称做“后文革”。应该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在其发动者毛泽东去世、“两案”审判、《决议》发表之后即基本结束，但作为观念形态意义中的“文革”却并未中止，它滞后于政治与经济的客观存在与变化而存续下去。这需要历史学者做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去梳理剖析。这次完成的“数据库”和新版光盘辑录了相关的资料，增补了属于思想文化范畴的史料，让人们得以从更高的位置和非同寻常的视角去观察和反思“文革”。

与《文库》光盘第一版相比，“数据库”增补了六分之一的内容和全新的英文检索功能，其中五百万字是新增文献，而且一半以上的内容作了重新校勘，把近年海内外学者辛勤收集、考证、录入的资料全部补了进去。这体现在以上列举的纲目内容中，也体现在一些地方性资料的增补上。例如，在我所感兴趣的武汉地区“文革”资料方面，“数据库”就增补了湖北省委1966年历次省委常委会讨论的重要记录摘要，以及“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文革”后对他审判的法庭上的自我陈述。

“数据库”比单纯的光盘更方便研究者和读者，它不仅仅是个动态的数据库，“网络版新资

料会每月每年输入，数据库功能不断增强”，而且还发展成为一个网站，“另有网络版可供订阅……并具有远距离网络登录和下载功能”（引自“编者前言”）。有兴趣的“文革”研究者将可以随时了解“数据库”增补的内容，不断得到最新的辑录资料。

“数据库”目前排列的主题纲目基本上反映了民间与海外研究学者的概括模式，它是否完全合理（包括孰纲孰目），是否已囊括了“文革”大纲的林林种种，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比如，“文革”的所谓理论始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整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等，“数据库”里有关文化思想领域斗争的材料是否可以再上溯，收入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又如，这个主题是否可以走出“最高领袖”的局限，把“周恩来”单独作为一个纲目？此外，众多的专案材料和个人检讨书、交待材料，既是血泪斑斑的文物，也是珍贵资料，网上文库也不妨斟酌辑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新版“数据库”，相信更多的人会发见所获丰盛。不仅民间学者和青年学生可能如此，高校、科研院所和官方机构也会如此。尽管体制内的单位订购与使用《文库》第一版的光盘时就遇到了某些限制，但我相信，象“数据库”这样公开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国界、政治界限的，更不应该对使用单位设限。《文库》第一版业已有众多体制内研究者所用，但愿“数据库”将会为更多的体制内学者与图书馆管理人员所征订使用。

□ 《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1期

~~~~~

#### 【书刊评论】

见微知著，集腋成裘

——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

• 唐少杰 •

十余年前，我在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库存本阅览室的藏书楼里，望着那成千上万册（卷）的文革传单、文集、报刊等文献资料，既有“收之桑榆”之喜，因为清华大学在文革初期曾是全中国大陆极为少有的各地文革资料（主要是群众组织小报和传单）的汇集地之一，这为研究文革提供了颇为有利的原始资料查阅条件；又有“望洋兴叹”之感，因为以我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实在难于把它们浏览一遍，更不用说熟记心间、运用自如了。鉴于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状况，对于这些布满了灰尘、沉睡了二十年多之久的文献资料，我只能连嘲讽带调侃地借用清华园工字厅后面悬挂的晚清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撰书的那著名楹联来略表惆怅：“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换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我当时期盼着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有志之士将会编纂出收集比较齐全的文革文献资料汇集，但又为这一浩大、庞杂、艰苦的工作而感到希望渺茫，更主要的是为长期以来的中国国内文革研究的艰难环境而信心不足。然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美国著名的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周原先生和他们的同仁们，不仅在五年前完成了洋洋大观的百卷本《新编红卫兵资料》（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印，1999—2002年）的编纂和出版，而且在全世界首次完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的编撰和发行，即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隆重推出了文化大革命网络数据库及其CD光盘，这是全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的、专业化的文革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及其光盘的问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是文革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感谢宋永毅先生（现任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内的七位北美华裔文革专家和一位台湾学者，他们历经近十年，克服数不尽的曲折，甚至度过说不尽的苦难，才最后完成了这一文革研究里程碑式的重大工程。包括宋永毅先生在内的编撰者们的名字完全值得文革研究者们所铭记，他们是：明尼苏达州诺曼学院丁抒教授，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芝加哥大学王友琴教授，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沈志

佳博士，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学院周泽浩教授和国立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

2006年，在文革爆发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特别是在文革的故乡文革研究依然处在风声鹤唳、万马齐喑的情况下，传来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上述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经过编撰者修订的新版（亦称第二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据编撰者所言，这一新版的文化大革命文库是在2002年版的文化大革命文库数据库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当我获得那张宝贵的新版文化大革命文库的CD光盘时，真是喜不胜说，可谓一盘在手，便可通览文革历史的主要的原始资料。当把这张光盘输入电脑后，洋洋洒洒的数以千万字之巨的文革资料以及相关材料，真可谓尽收眼底，选用自如。

毋庸置疑，2006年新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一电子媒体性的文库的完成和发行，不但会强有力地促进文革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征集、开发和使用，而且必定会促进文革研究本身的深入、细致和创新，正如该文库序言中所言：面对文革“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采用传统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数百本之多，连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却使它们能浓缩在一盘体积极小的光盘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个文库光盘正是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文革博物馆’”。据悉，目前，世界上已有近百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以及图书馆订阅了这一网络数据库或其光盘。

我个人认为，2006年新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新版文库更加丰富、翔实。与2002年版的文化大革命文库相比，新版的文化大革命文库最主要的长处就是它的数据收藏进一步增大，即由原来旧版的三千万字的文献容量增加到新版的三千五百万字的文献容量。新增加的五百多万字的文献，既为过去文革资料汇编中是十分罕见或非常少有的，也对今后文革研究来说是相当珍贵的。

二是新版文库更加可信、可靠。新版文库的主编者和编撰者，听取了旧版文库出版、发行之后有关学者提出的批评建议，改进了旧版文库中的众多文献在电脑屏幕显示页面时没有注明出处的缺点，现如今十分醒目而又清楚地标示出了每一文献的来源或出处，即新版文库中所收集的全部关于文革之前、文革之际和文革之后的中共中央文件、指示、公报、中共领袖和首长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和当年的重要大字报、小报、传单等等，都列出了令人信服的资源依据。更为可贵的是，新版文库同旧版文库相比，编撰者对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文献内容进行了重新校勘。

三是新版文库不仅在其软件安装上比旧版文库的软件安装更加简便易行，而且在检索上或使用上更加灵活、有效。新版文库还增加了旧版文库所没有的“打印”、“标明被检索的关键词”、“中英文互换”等新功能。新版文库除了中文简体字文本之外，它还可以使用英文文本的“总目录”、“主题”、“日期”、“作者”、“标题”、“全文”、“发文机构”和“关键词”等提示词来进行查阅。这样就大大地方便了查阅者，特别是给那些想要了解或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外国学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四是新版文库的使用形式更加多样、方便。新版文库不仅呈现为小巧玲珑的一张CD光盘，可为携带此光盘的使用者随时随地所查阅，而且它登录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有关网站中（<http://ccrd.usc.cuhk.edu.hk>），使用者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打开电脑，成功上网，就可订阅或查阅到新版文库的网络数据，并查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仅仅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新版文库的网络版一旦订阅，该大学的全校师生均可以无限制地进入使用，并具有远距离网络登录和下载的功能。

能。

五是新版文库进一步表现出开放的、动态的、求新的特征。新版文库的编撰者明确地坚持要使新版文库的网络数据库富有随时不断增加新发现或新补充材料的特色，他们要孜孜不倦、长期不懈地把新得到的文革数据及时地补充到文库的网络数据中，甚至是按照每月每年的方式来适时地加以输入，进而使得整个网络文革文库的内容不断丰富、扩大，使得文革文库的数据库功能不断具体、增强。新版文库的这一重要特征实实在在地表明了网络版的文革文库比起光盘版的文革文库具有流动常新、与时俱进的特性。

我个人认为，新版文库有待改进的一个主要之处在于：整个文库应该切实重视省级以下地区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文革文件或文章、著名事件的原初文本以及著名人物的原初资料等等的汇集和编撰，甚至应该大力加强这一工作。进而，在进一步巩固和充实现有文革文库前五部分内容的同时，加强并加大对于地方性、基层性和群众性的文革资料的开发。若是作到这一点，就不难完整地显示出整个文革在领袖与群众、中央与地方、热点与边缘、上层与基层、部门与单位、“正宗”与“变异”之间乃至所有这些方面的每一个方面自身之中的关联、互动甚至差异。当然，提出这一要求决不限于文革文库的编撰者们，而是有待于所有关心文革研究的人们和从事文革研究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新版文库的另一个明显不足，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不具有“中文繁体字文本”的功能，而旧版文库却有这一功能。“中文繁体字文本”功能的缺失很有可能给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学者或华人查阅者的使用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不便。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使网络版的和光盘版的文革文库数据库具有中文繁体字文本的检索或查阅的功能并不是一件难事。

非常令人欣慰而倍受鼓舞的是，文革文库的主编者宋永毅先生表示：文革文库的编撰者们并不把文革数据的收集局限在1966至1976年，而是信奉一个“大文革”的观念，即把文革前的六十年代的“四清”，五十年代的“反右”等政治运动也看作是文革的前奏；把文革后的“清查”运动也看作是文革的延续。因此，这方面的材料在网络版的文革文库数据库中已经开始输入。“将来十年中，这一数据库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共建国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史的最大型的数据库。”我们衷心祝愿这一雄心勃勃的未来十年工作计划能够顺利地早日实现。

□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4月号

~~~~~

【读书笔记】

郑光路的《文革文斗》和《文革武斗》读后感

• 欧阳龙门 •

到目前为止，在中央和全国层面上描述文革的专著海内外都已经出了一些（1），在个人层面上描述文革中的经历、见闻的回忆则多得不胜枚举。而像最近出版的郑光路的《文革文斗》和《文革武斗》（2）两本书那样，在省、市一级的层面上描述文革的专著则还很少，而以中文出书的更是少之又少（3）。

这两部书以全国范围的文革为主线，以四川和重庆为主要案例，同时参考其他地区，展现了文革中1966年到1969年这段时间里的“文斗”和“武斗”。

由于作者郑光路不仅经历，而且亲身参与了文革中的活动，从当时开始就注意收集各种相

关的资料，所以这两部书拥有的原始材料非常丰富，描述也十分生动具体。

例如，对于曾经震惊全国的1967年5月，成都132厂开枪流血的武斗，作者以客观地态度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列出了具体的伤亡数字。

又例如，作者对于四川几大群众组织，尤其是著名的成都保守派组织“产业军”的兴衰也有具体的描述。而现有的文革记述，多数集中于红卫兵、造反派，较少记述那些被瓦解了的保守派。中外图书馆的文革资料收藏，多以红卫兵（保守的和造反的）、造反派的材料为主。这两本书所收集的保守派组织的原始材料，是比较丰富的。

作者以客观的角度地描述文革当局和各派群众组织参与文革的活动，也是值得称道的。作者所取的角度既不是“官方”的，也不是“反官方”的。“官方”与“反官方”两者都有出于政治目的而歪曲历史真相的偏向。

许多描述文革的回忆录、口述史，多有片面之处。例如当权派的回忆，往往详细记述自己被迫害的旧事，而对于自己参与、主导迫害别人，则一笔带过，甚至完全不提，似乎从未发生过。也有当年的文革参与者，仍然持有当年的“派性”，大肆渲染对立派别的劣性，对自己和自己派别的错误、罪行或者完全忽略，或者轻描淡写，或者强调客观环境使之而“不得已”。

这两部书在拥有丰富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文革中的许多事件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结论，其中有些为以往的文革著述所忽视，或者描述得不尽符合事实。

例如文革初期的派“工作组”事件，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公开化的大事件，刘少奇在较量中失势而败落，成为以后的文革发展最重要因素。现有的官方说法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派出工作组”〔4〕，“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支持和挑动下，不少学校发生轰赶工作组事件。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5〕

然而，这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郑光路的这两本书指出：“工作组的‘工作’其实就是大肆整人，在群众中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四类人’等。”〔6〕，“打击面之宽，之狠，令人触目惊心，后任难以想象。这是文革运动后来纵深发展极重要原因和催化剂。”〔7〕

这两本书在例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之后，得出结论：“文革运动如果真像刘少奇等人设想的就此结束，其整人后果比1957年‘反右派运动’还要恐怖，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家庭要再过地狱般的生活。”〔8〕

官方的说法给人的印象是：有人“造反”、“轰赶工作组”，工作组“不适当地”打击了这些人。

从这两本书里我们看到：工作组不仅仅是打击反对他们的人，也打击其他被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人。即使是在那些并没有人反对工作组的地方，工作组照样要划出一大批“反革命”、“右派”加以打击。

官方的说法只能解释为什么有人起来造反。两本书列举的事实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人起来造反，而且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度有那么多的群众支持造反。

关于“二月逆流”的描述,《文革武斗》没有仅仅局限于“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而是结合了“二月逆流”在各地,尤其是四川的具体表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是:“在文革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时期内,还掌握军权的中央及各省市干部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和各地‘造反派’势力的对抗,试图恢复文革前的秩序。”〔9〕

在简述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这些为官方大肆渲染的事件之后,《文革武斗》以专门的章节记述了四川的“二月镇反”。该书的客观性表现在:既描述了激进的造反派在全国夺权的“一月风暴”高潮中对成都军区的围攻,也描述了成都军区、保守派组织、以及另外一些造反派组织对进攻者的疯狂镇压。该书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是“成都军区试图恢复文革前秩序”。〔10〕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高潮,终于变成了“全面内战”的“武化大革命”。中共官方的文革史将此归咎于“林彪、江青一伙”“肆无忌惮地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归咎于“江青”“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11〕

王年一则含蓄地提到了“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12〕。对与毛泽东曾发出“武装左派”的指示,当时的知情人王力曾有说明。〔13〕

《文革武斗》一书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文革武斗灾难的造成,毛泽东有难以推卸的责任。”〔14〕该书用专门的一节,以确凿的证据指明:毛泽东武装左派的讲话在前,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后。该书以第一手资料证明:“鼓吹武斗的‘武装支持左派’的指示,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下达的”。而且这个指示确实实传达到了基层,“四川省革筹第一号领导人(省革筹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1967年8月29日在军区营职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这一指示,并且提出了在四川贯彻这个指示的原则和具体办法。〔15〕

本文认为《文革文斗》和《文革武斗》这两本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开创性的特点。作者完全可以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写出一部四川文革史,成为第一部以中文出版的、在省级层面上描述文革的通史。

最后,本文要指出这两部书的不足之处:

虽然这两部书具有资料、手册的性质,但是这两部书没有一个索引,这也是多数中文史书的一个共同缺点。建议作者在今后的再版、新书中能提供一个较好的索引而更具使用价值。

这两部书引用的资料很丰富,但是在格式上却没有将引用资料和作者的描述与评论明显地区分,因而使读者感到混淆。建议作者今后能以不同的字体、段落来区分引用资料和作者的描述与评论。

注释:

〔1〕笔者见到的全国范围的文革史有: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Barnouin, Barbara,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MacFarquhar, Rodreick and Schoenhals, Michael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郑光路《文革文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之喧嚣怪状》，美国海马图书公司，2006；郑光路《文革武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美国海马图书公司，2006

(3) 迄今笔者所见多是英文著作，中文著作尤其少。较早的著作有以广州文革为案例的：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r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Boulder: Westview, 1982；描述浙江文革的：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r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 Zhejiang, 1966—1976》，New York: Sharpe, 1990；描述内蒙文革的：Woody, 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Extracts from an Unpublished History》，Stockholm University Press, 1993；描述武汉地区文革的：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Hong Kong: Oxford Univ. Press, 1995；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 银河出版社，2005年；描述上海文革的：Perry, Elizabeth,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 Westview, 1997。

(4)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92页

(5)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94页

(6) 《文革文斗》第18页

(7) 《文革武斗》第6页

(8) 《文革文斗》第20页

(9) 《文革武斗》第168页

(10) 《文革武斗》第153页

(11)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56页

(1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6页

(13) 《王力反思录》香港 北星出版社 2001年，第651页，第810页

(14) 《文革武斗》第232页

(15) 《文革武斗》第249页

~~~~~

## 【一家之言】

###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选载）

• 周泉纁 •

#### ◇ 作者自序（摘录）

本书原先计划中的名称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后来，听说国内外有的读者读了我的《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之后，对其中关于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看法提出异议，为之我突发灵感，决定将本书改名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简称《试错》。“试错”一词，在概念上，是指科学界为了寻找正确理论，用实验的办法排除可能的理论错误的意义。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的意思，指文革是人类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必然的探索过程。

现在距离文革发动虽然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是世人对文革关注的热度不减，并且有关文革的看法分歧极大：有人认为，文革历史如同二战史一样，是中华民族可耻的浩劫史；还有人认为，文革只是毛泽东主席错误地搞个人崇拜和封建集权的结果，因此文革是我们民族



的一场噩梦；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文革的目的和宗旨就是为了防治中国共产党腐败，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一直相当严重，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一种不治之症，因此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让国人彻底否定和遗忘文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甚至断言在未来的中国，迟早会爆发真正彻底砸烂共产党腐败体制的二次文革，到那时中国才可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我认为上述种种有关文革的看法，都是片面和不正确的。为了方便读者迅速读通《试错》这本书，我用人类探索治疗癌症的正确途径为比喻，将《试错》破解文革奥秘的内容通俗地展示出来：

（1）如果，我们将解放前蒋介石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比喻为中国社会身上的癌灶；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好比是西医切癌灶的外科手术；同时，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如同西医治疗癌症时动完手术后的过度的化疗或放疗。

（2）由于文革如同西医的过度化疗或放疗一样，虽然可以大力度地杀灭社会的癌细胞，但同时也大力度地杀灭社会的好细胞，甚至要了社会的命，所以有人评判文革如同评判西医的过度化疗或放疗一样，是“彻底错误的”，是“一场浩劫”。然而，持相反意见的人们则认为，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革开放都解决不了中国社会滋生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所以相当于西医治癌症的过度的化放疗的文革，迟早还得在中国再现。

（3）然而，事实上与人类探索癌症治疗途径一样，中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终于像人类开始发现以中医“扶本祛邪”为主、以西医开刀放化疗为辅的方法才是防治癌症的正确办法一样，发现了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治疗腐败的“阶级合作”的好方法，这个好方法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治国方略：“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路线，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

所以，我在《试错》中认定：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因此中华民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同时，事实上通过失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证伪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性的试错，不仅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了全面崛起的快车道，而且使世界迅速走出了两极冷战的历史误区，甚至使全人类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

## ◇ 总 论

众所周知，中国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晚年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从而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和现代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文革结束三十年来，由于国内外舆论的主导潮流对文革的评说，一直在社会局部的功利得失和道德情感问题上纠缠不休，既没有正确有效地回答文革正面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没有真正搞清楚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当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重新面临贫富悬殊和腐败的挑战的时候，文革的幽灵又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了。所以，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应用我1997年创生的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破解文革的失败原因并正确回答文革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以便引导世人从人类社会发全局的高度，去重新正确评判文革和记取文革的教训。

### 一、存在三种否定文革的理论观点（文革错误论、文革浩劫论、文革试错论）

实际上自文革结束后三十年来，作为社会舆论的主导潮流，否定文革的理论观点不外乎两种：第一种观点，我称其为“文革错误论”；第二种观点，我称其为“文革浩劫论”。

关于“文革错误论”，大致上又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实际上也是官方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主要是领袖毛泽东主席个人失误引起的、被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林彪、四人帮利用的历史性的严重错误。言外之意，如果毛泽东主席能够坚持党内民主、不搞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文革是可能避免的。

第二种观点，在文革两派红卫兵头头中流行较为普遍。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合理的，文革失败主要原因是造反派红卫兵的素质低下、派性严重、不能团结大多数群众、从而坐不稳文革打下的江山的缘故。

第三种观点，干脆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打开了潘多拉神盒，放出了一群造反派恶魔，结果搅得整个中国昏天黑地几乎难以收拾，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动用铁的手腕将造反派这帮恶魔捏得粉碎，文革也就只好以彻底失败而收场。所以，文革期间中国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按照文革理论发动的文革，一个是群众按照自己实际利益和切身感受进行的文革，由于两个文革完全相悖，所以导致了文革的惨败。

“文革错误论”实际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试图“打下天下，坐天下”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

关于“文革浩劫论”，一般地讲，在倾向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人们中比较流行。“文革浩劫论”认为文革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的社会浩劫，是毛泽东反人权、反民主、反现代化的思想和相关的社会体制必然导致的大动乱大倒退，文革不存在任何历史的合理性。

“文革浩劫论”实际上代表了两极冷战时期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经济上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

经过长期艰难的实践和研究，我在1997年终于在佛祖的“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大彻大悟，发现“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都是错误片面的，关于文革的唯一正确全面的观点，是我创生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派生的“文革试错论”，“文革试错论”认为：

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两极冷战之必然；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民族与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相互残杀和政权暴力更替恶性循环之必然；文革决不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是人类社会不记取历史教训从而重复过去老错误的浩劫，而是类似古罗马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古中国陈胜吴广农民暴动、近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现代的十月革命那样，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因此，没有文革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改革开放，没有文革世界就不可能迅速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迅速走出两极冷战的误区；没有文革人类就不可能迅速认识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之本质，从而迅速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所以，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文革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勇于试错的探索精神，将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永葆青春！

“文革试错论”实际上代表了现代社会诸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利益和政治倾向，这种利益和政治倾向就是现代人类在现代必然主政的知识阶级领导下构建和谐世界的利益和政治倾向。

## 二、“文革试错论”的哲学理论依据

“文革试错论”不仅是在证伪“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文革试错论”作为现代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在证伪现代无产阶级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现代资产阶级的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了让读者对“文革试错论”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在本书的“总论”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文革试错论”理论来源。

### （一）统一论哲学的基本原理

历史证明，几千年来人类的世界观原则上都被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唯心主义哲学统治着。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唯心主义哲学都认定宇宙起源和本质为一元化的物质或一元化的精神。所以，中国的老子有一生二、二生三、生万物之说，德国黑格尔有宇宙合而为一为绝对精神之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世界唯物之说，最后现代科学也认为在宇宙大爆炸的起点（宇宙奇点）上的物质是绝对统一的。

然而，近些年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在宇宙大爆炸的奇点上的物质不是绝对统一的，其内部是存在具体的结构的，只不过在宇宙大爆炸奇点上的物质结构比我们地球上的物质的结构要密集得多，其中的粒子只能以大大地超过光速的速度运行，才能维持宇宙奇点上的极为密集的物质结构罢了（请参阅英国伦敦技术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卢杲论著的《统一强核力、电磁力、引力、弱核力》）。由此可见，几千年来统治人类的世界观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起点，即认为宇宙的起源和本质是一元化的物质或精神的观点，是没有任何科学实验依据的。因为，物质一旦有自己的“结构”，就意味着物质永远与其“结构信息”同在，即物质与信息（精神）永远对立统一地同在，绝对一元化的纯粹的物质或信息（精神）在宇宙中根本不可能存在。

因此，1997年我在学佛过程中，突然顿悟和发现佛祖释迦牟尼创生佛教的原始理论，即二元论的“缘起说”思想，是人类几千年来唯一正确的哲学思想。

佛祖的“缘起说”思想认为“大千世界，缘生缘灭，无始无终”。佛祖讲的“大千世界”就是指宇宙；佛祖讲的“缘”，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讲的“因缘”、“关系”或“矛盾”；佛祖讲的“缘生缘灭”是指充满宇宙的“因缘”、“关系”或“矛盾”，永远只能转换形态而不可能消灭或灭亡；所以，佛祖明确指出，宇宙是缘生缘灭和无始无终的。

于是，我将佛祖的“缘起说”思想拿到现代科学中去检验，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整个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中所有的正确的理论都无条件地支持佛祖的“缘起说”思想，更重要的是凡是不支持佛祖的“缘起说”思想的科学理论，都是没有科学实验依据的主观猜想，例如前面讲的宇宙大爆炸起点（宇宙奇点）上的物质是绝对统一的观点就属于此列。

所以，我以佛祖关于“大千世界缘生缘灭”的“缘起说”思想为理论起点，创生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统一论哲学”，同时又由“统一论哲学”推演和派生出“阶级合作理论”和“文革试错论”。

### （二）统一论哲学的本体论

“统一论哲学”的本体论是“宇宙规律系统理论”。

首先，“宇宙规律系统理论”认为，宇宙规律作为统一的整体或系统是由三大具体的宇宙规律组成的，宇宙的三大具体规律是：宇宙缘生缘灭规律；宇宙有序发展规律；宇宙中的系统三位一体规律。

因此，宇宙的三大具体的宇宙规律，对控制宇宙间的所有的具体事物或系统而言，都是必要和充分的，即宇宙的三大具体规律的三种控制作用，在宇宙的任何时空中，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杀灭；至于宇宙的三个具体规律对具体的事物或系统的控制作用的比率关系，则决定于具体事物或系统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关系。

“统一论哲学”的“宇宙规律系统理论”中讲的三大具体的宇宙规律内容如下：

#### （1）“宇宙缘生缘灭规律”

“宇宙缘生缘灭规律”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上面已经讲的佛祖“缘起说”思想关于“大千世界，缘生缘灭，无始无终”的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充满宇宙的“因缘”、“关系”或“矛盾”，永远只能转换形态而不可能消灭或灭亡。例如，现实中的男人和女人这对矛盾只能具体地转变形态而不能消灭。又例如，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的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可以转换形态，比如转化为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但其实质无法改变或消灭。很明显，“统一论哲学”关于“宇宙缘生缘灭规律”的理论，从根本上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所以，“宇宙缘生缘灭规律”明确指出，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起，宇宙中的基本矛盾有五对：首先是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其次是物质与信息的矛盾；第三是事物或系统与其环境的矛盾；第四是人的实体结构与人的思想意识的矛盾；第五是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等。

#### （2）“宇宙有序发展规律”

“宇宙有序发展规律”实际上是由“宇宙缘生缘灭规律”直接推导出来的。由于宇宙万物组成的矛盾在其生命周期内，既不能相互杀灭也不能合二为一，因此必然导致：宇宙的时空永远在单方向无限膨胀；宇宙万物的具体形态永远都不可能重复；宇宙万物的物质结构只能从简单走向复杂；宇宙中事物或系统的信息量只能从小变大；宇宙中所有具体矛盾的双方虽然不可能合二为一但是相互间的关系只能从对立走向统一；最后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速度永远在不断地增加。很明显，“统一论哲学”关于“宇宙有序发展规律”的理论，是对江泽民主席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的强有力的支持。

#### （3）“宇宙三位一体规律”

“宇宙三位一体规律”实际上是直接从现代科学家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推导出来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宇宙间所有的事物或系统，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都能自动调整自己的内在结构去适应自己的外在环境。所以，从宇宙从大爆炸产生最简单的氢原子起，到今天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为止，宇宙间所有的事物或系统，其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都必然都自发地倾向于由三个要素形成三对连环式的矛盾组成的三位一体形态，因为现代应用科学证明，三位一体的形态相对而言能耗最低、效率最高、稳定性最强。下面读者将会看到，应用“统一论哲学”的“宇宙三位一体规律”，可以论证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结构，是现代三大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和谐制衡、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的模式。

### （三）统一论哲学的认识论

“统一论哲学”的“认识论”，是以“顿悟理论”为核心的“思维理论”。“统一论哲学”的“思维理论”认为：

（1）依据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人是思维指导实践去适应和改造环境的高级生命系统，所以人的思维或认识不可能是一元化唯物的或唯心的，而只能是二元化的、随缘的或主客观统一的。例如，对于同一个妇女，其父识其为“女”、其夫识其为“妻”、其儿识其为“母”，三个男人对于同一个妇女的三种认识之所以都正确，就是因为人的认识永远是二元化的、随缘的或主客观统一的。所以，人的认识不但决定于客观的人的认识对象，而且也决定于人的主观方面的“认识能力”。而人主观方面的“认识能力”，既决定于人作为生命基因系统长期适应环境的先天性的进化积累，又决定于人后天的实践积累。

（2）依据现代心理学家皮亚杰的“思维图式理论”，人的认识过程是人的思维在既定的逻辑控制下，对来源于认识对象的新的信息与过去存储在人的记忆中有旧的复合（人的既定逻辑原则上是人记忆中的所有的思维信息的综合结果）。例如，我们在校庆中与老同学久别重逢，我们对老同学的识别过程，是老同学的现实的新形象与过去的旧形象，在我们头脑中的识别陌生人的既定逻辑控制下的复合；因此，当我们识别久别重逢老同学时，老同学的现实的新形象、过去的旧形象与我们识别陌生人的逻辑三者缺一不可。所以，人的思维是一个思维信息不断增长和更新的单向的不可逆发展过程；同时人的认识的真理水平，主要决定于人的既定逻辑的真理性的水平。

（3）由于人的逻辑的突变和更新，对于人的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必然对于人的实践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人的思想和实践不能适应人的外在环境时，就意味着人的逻辑面临来自人的外在环境信息的挑战，而需要更新。“统一论哲学”发现，人的逻辑的突变或更新过程是一个顿悟过程：当指导人的思维或思想的旧逻辑，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遇到挑战时，一旦这种挑战积累到某种圆满的程度，人的思维或思想就可能突然自发地顿悟，从而神奇般的彻底推倒人的思维或思想的旧的逻辑，并同时建立起人的思维或思想的新的逻辑。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科学界用科学实验和科学理论竞争对牛顿的“以太理论”不断地进行挑战的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划时代地推倒了牛顿关于以太物质绝对存在的旧的错误的科学逻辑，树立了宇宙万物彻底相对的新的正确的科学逻辑。

人的顿悟过程的神秘性在于：人在顿悟前不可能预见自己顿悟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内容，而当人在顿悟之后，再回望和对比顿悟前后的新旧逻辑时，就会惊奇地发现顿悟更新的逻辑，原本就是顿悟前人的实践对旧逻辑的挑战积累之必然。所以，人的顿悟过程雄辩地证明了人思维中的信息系统，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的突变规律。

### 三、“文革试错论”的政治理论依据

依据“统一论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就可以推演出关于人类社会的“阶级合作理论”。“统一论哲学”派生的“阶级合作理论”就是“文革试错论”的政治理论依据，其中有关的主要内容如下：

（1）人类社会首先不是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一元化的唯物的系统，而是物质和精神原则平等和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的系统，同时也是社会内在结构与外在环境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系统。换言之，依据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人类社会是能够自动调整内在阶级结构

去适应外在的国际和历史环境最高级的生命群体系统，因此能够自动调整内在的阶级结构去适应自己外在的国际和历史大环境，是具体的人类社会在世界上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标志。

（2）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原则上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一元化的结构，而是多元化的，是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结构。从阶级的角度看问题，人类社会的基本阶级有三个而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只有两个，它们分别是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和知识阶级。人类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在它们共同的生命周期之内，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必要和充分的，它们决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可以相互杀灭或改造；因此人类社会三大基本的阶级，原则上只能在适应共同的外在环境的条件下，同舟共济、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其中，财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积累社会财富；劳动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从事社会劳动；而知识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处理和积累信息或知识，建设和运用政权管理社会。

（3）人类历史上三大基本阶级在具体的人类社会所显示的地位的差异，原则上决定于具体的人类社会所适应的特定的国际和历史大环境，因此人类历史上各种具体的人类社会在结构上的差异，只是三大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理想的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适应国际和历史环境的要求，将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制衡关系尽最大可能地调整到“等强度制衡”的水平的和谐社会。具体理想的和谐社会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关系，其最终标准决定于适应外在国际环境的需要，其具体的形态还决定于具体社会的历史条件，但其实质只能是三大基本阶级为了适应共同的国际环境，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可能支配谁。所以阶级“等强度制衡”的理想的人类社会，是远离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相互残杀，远离国家政权暴力更替的和谐社会。

（4）人类社会自从产生阶级以来，原则上有序地出现了三种常规社会：第一种常规社会是劳动阶级主政的“母系社会”；第二种常规社会是财产阶级主政的“父系社会”，“父系社会”有三个有序的变种，它们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它们分别由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主政；第三种常规社会就是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这是现代知识阶级主政的和谐社会，也是现代人类的理想社会。因此，人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名称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常规社会，一种是现代资产阶级主政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另一种是现代知识阶级主政的现代西方瑞典模式的社会。

（5）在“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与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在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特殊的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是东方“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无产阶级为代表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进行反抗资产阶级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革命建立的社会，因此它们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对立，形成世界两极冷战之格局。世界两极冷战格局有两种历史作用，一是逼迫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加速和平演变为现代西方瑞典模式的社会；二是逼迫东方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试错，加速向西方瑞典模式的社会靠拢；从而让全人类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

（6）人类社会的三种常规社会和一种特殊的社会，其内在的阶级结构是不同的：劳动阶级主政的“母系社会”，三大阶级都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这种社会以代表社会主要生产力的“母亲”为核心的社会；财产阶级主政的“父系社会”，原则上是财产阶级统治非财产阶级的不平等社会；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是现代知识阶级主政的和谐社会，社会三大基本阶级原则上是平等制衡、共同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三大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水平最高的理想社会；最后，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特殊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作为对抗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社会，三大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水平最低，它完全是社会规律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向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演变的现代的工具。

（7）阶级结构不同的人类常规社会和特殊社会，其发展逻辑或“结构逻辑”也是不同的。所谓社会的发展逻辑或“结构逻辑”，是指社会三位一体的阶级结构的“框架”、“模式”或“标志”，它实际上就是社会主政阶级治理社会的总方略。例如，“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结构逻辑”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改造其他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结构逻辑”是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

（8）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通过思维指导下的实践进行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社会，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从信息运动和变化的角度分析，与人的思维过程和规律，原则上是相同的：

首先，由于人的认识过程是人的思维在既定的逻辑控制下，对来源于认识对象的新的信息与过去存储在人的记忆中有关的旧信息的复合；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来源于社会外在环境的结构信息与社会内在已有的结构信息，在社会“结构逻辑”的指导和控制下的复合，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按照如此模式进行的。

同时，由于人的思维存在更新逻辑的突变规律或顿悟规律，因此人类社会也存在更新自己的“结构逻辑”的突变规律或顿悟规律：人类社会“结构逻辑”的更新过程也是一个顿悟过程，当人类社会旧的“结构逻辑”因为不适应社会外在环境而不断地遭到时代的挑战时，一旦这种挑战积累到某种圆满的程度，人类社会就可能会自发地突变或顿悟，从而神奇般的彻底推倒人类社会旧的“结构逻辑”，并同时建立起人类社会新的“结构逻辑”。例如，中国社会在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之前，包括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都是中国社会对旧的无产阶级专政“结构逻辑”的挑战的积累过程，而“三个代表”思想则是中国社会划时代的顿悟结果，它事实上彻底推倒了中国社会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逻辑”，同时树立起中国社会的新的三大基本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结构逻辑”。

#### 四、“文革试错论”的基本观点

依据前面展示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就可以推演出“文革试错论”的基本观点如下：

#####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之必然

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财产阶级（资产阶级）主政的社会，由于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结构逻辑”，即资产阶级的主政方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无法适应空前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所以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力度和速度也是空前的，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性，无产阶级普遍被“逼上梁山”。在这种严酷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首先发现“阶级相互残杀政权暴力更替的恶性循环”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癌症”，为了根治人类社会的这种“癌症”，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于是，有关国家在知识精英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动和领导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陆续建立起不少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两极冷战的世界新格局。从此之后，在两极冷战的国际大环境的压迫下，西方社会被迫重新调整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关系，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自在地创生了现代瑞典模式社会（和谐的福利社会），不但使西方社会避免了原先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使西方社会逐渐远离“阶级相互残杀政权暴力更替的恶性循环”。

所以，“文革试错论”首先认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社会走向灭亡之必然。换言之，如果没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推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资产阶级要迅速退出人类社会主政的历史舞台是不可能的。

## （二）毛泽东思想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必然

从1949年至1956年底，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震惊的伟大胜利，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抗美援朝的胜利；土地革命的胜利；对全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教育的成功和胜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步胜利；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恢复国民经济的成功和胜利等等。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主政方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结构逻辑”。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呢？无产阶级专政逻辑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的三位一体的内涵如下：

（1）在经济领域里，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通过对立的斗争，使用价值最后消灭价值得到统一，结果商品消灭，计划经济替代商品经济。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在经济领域里意味着企图消灭商品经济的自然规律——价值规律。

（2）在政治领域里，正如1964年中共《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讲的：“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说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想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在政治领域里意味着企图消灭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

（3）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专政逻辑意味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世界观，成为人类文化领域里唯一的源泉和标准。换言之，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在人类的文化领域里，意味着企图消灭人类多元化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规律。

（4）最后，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的上述三位一体的三方面的内涵综合起来，在哲学上就演化为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到“矛盾通过一方消灭另一方统一实现统一”的逻辑，简称毛泽东的一分为二逻辑。具体举例来说：例如文革开始，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政的统一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分为二为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接下来，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统一为毛的文革司令部；再接下来是毛的文革司令部又一分为二为中央文革为首的现代法家司令部与周恩来为首的现代儒家司令部；……如此地从“矛盾的一分为二”到“矛盾的一方消灭另一方”一直进行下去，极端地讲，世界最后变成一元化的铁板一块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宇宙最后变成一元化的铁板一块的所谓的“纯粹唯物的物质”。总而言之，无产阶级专政逻辑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消灭价值”的逻辑；“无产阶级消灭其他所有阶级”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消灭世界上任何其他任何文化”的逻辑；由“矛盾一分为二”向“矛盾一方消灭另一方”方向发展的一元化的完全彻底革命的逻辑。

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结构逻辑”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说明：



首先，从阶级的角度看问题，中国社会无剥削阶级的宝塔式的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形成：最上层是执政的“当权派”阶层；其次是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先进人民”阶层，这主要是指工人和贫下中农；接下来是包括中农、上中农、一般知识分子和在人民中政治地位最低的剥削阶级子女在内的“普通人民”阶层；最后是包括资产阶级分子在内的被改造或被镇压的剥削阶级分子阶层。

其次，从社会领域的角度看问题：在经济领域里，以集体农业为基础以国有工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顺利运转；在政治领域里，共产党政权已经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在文化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核心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

所以1956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的鼎盛之年，然而越过1956年这个鼎盛之年，共产党的信仰，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逻辑”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遇到了社会实践不断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右派进攻。

以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右派分子，利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机会，直接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为武器，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这无疑大大出乎毛泽东所料，因此毛不得不用“引蛇出洞”的说词掩饰他不合时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法，并在党内一致赞同的前提下，干脆利索地将右派镇压下去。所以，反右斗争不仅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在的倾向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同时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其成功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逻辑”还没有被证伪之前，任何企图动摇它的统治地位的政治企图和社会实践，都是无效和徒劳的。

第二个挑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惨败。

据国外有关的学者测算，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全国因此而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之多。为此，彭德怀首先为民请愿向他的“老毛”发难；同时刘少奇也在党内公开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人祸”；最后直到今天，国内外和党内的舆论，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败的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反科学”和“好大喜功”的缘故。然而“文革试错论”认为，上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评说，都没有击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本质或要害。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发动在反右斗争结束后不久，广大知识分子已经被共产党动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法宝镇压右派之壮举吓破了胆，他们对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再也不可能说三道四，所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事实上成为清一色的广大工农劳动大众的运动。正因为如此，运动的实际情况确实如同毛评说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所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惨败，不仅意味着单独依靠劳动阶级的力量不可能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意味着，无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如何吹嘘劳动阶级如何的伟大、正确和先进，但是实际上劳动阶级与人类社会其他任何阶级一样，只要它脱离社会其他阶级有效的制衡，那么其自在的对立统一的本性中的劣根性必然会膨胀，最后使自己发生某种“异化”或“癌变”，从而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惨败，事实上在经济领域里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

此外，“文革试错论”还揭示，毛和他领导的干部和群众的素质，只是惨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实际载体而已，毛的“反科学”和“好大喜功”素质，之所以能够充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败的载体，是因为毛这些素质：在哲学上符合马克思的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

学基理；在政治上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地依靠无产阶级独掌天下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反科学”和“好大喜功”的；在情感上代表了当时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大众“打天下，坐天下”的意志和愿望。

第三个挑战，是苏联出现向西方和平演变的倾向。

在国际共运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同样受到苏联老大哥向西方和平演变倾向的严重挑战，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主张，包括专家治厂、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物质刺激等等在内，无疑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核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苏联向西方和平演变的倾向，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毛泽东不可能认识到苏联向西方和平演变的倾向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而属于现代必然主政的知识阶级的范畴，但是有一点毛相对于马克思而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因为毛从中已经意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决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领域的问题。

因此，在上述国内外各种力量和因素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的催逼下，历史决定了只要毛泽东还要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毛必然要结合当时历史的新情况新问题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创生文革思想，并借之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继续推进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事业。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毛的文革思想，在以下三方面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

（1）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但其辩证法并不正面否定黑格尔“合二为一”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双方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转化或矛盾双方可以通过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求统一。而毛泽东提出所谓的“一分为二”辩证法，干脆从正面否定黑格尔“合二为一”辩证法，并完全彻底地认定矛盾的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的方式是矛盾求统一的普遍方式。所以，从哲学来源上讲，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不仅不违背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彻底更全面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内含的无产阶级可以消灭资产阶级一统江山的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2）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认定毛的文革思想违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理由，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概念，而不是毛泽东文革理论所讲的意识形态概念，因此不可以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界定阶级。然而，依据“统一论哲学”，阶级永远是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对立统一的实体，与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事物一样，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或信息）两方面，不存在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同时，由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尤其在现代世界信息是可以联通和共享的，因此阶级只能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联系的概念，而不是以个别国家或民族为局限的断裂性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当年中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资产阶级所依存的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仍然可以依靠意识形态和与全世界的联系，顽强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复活自己的所依存的经济关系。实际上依靠自身信息机制和与世界的普遍联系复活或再生物质机制的事例在世界上普遍存在，比如当年中国没有原子弹的物质机制，但中国也可以依靠人类共享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研究出原子弹技术并自创出原子弹的物质机制来。所以，在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复活和再生阶级的经济关系问题上，与其说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文革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毛的文革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框，划时代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也承认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这就决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必然也承认阶级在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大领域也是在相互渗透的。所以，只要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就必然会在逻辑上推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基本上被战胜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政治和文化等

上层建筑领域里来。至于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具体界定阶级的问题，无疑是一个有待实践中摸索的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文革解决的主要问题。

（3）在国际上，正如上面所说的，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的基本逻辑，苏联走全民的党和专家治国的道路，显然不是通过不断革命去消灭资产阶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道路，所以只要毛泽东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就必然要反苏联道路而行之，继续沿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在的阶级斗争逻辑，发动文化大革命，探索和尝试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到底的新路子。与此同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毛泽东完全有理由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逻辑出发，认定当时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市场，肯定不是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后进国家，而应该是在苦大仇深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正好是第三世界的大国，所以中国理所当然地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总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1956年至1966年的中国社会国内外的条件下，必然要进化或演变为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革思想，同时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比当时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更为坚决和彻底。

### （三）文革是证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必然

依据“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中国文革前的社会作为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其“结构逻辑”——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还没有被证伪之前，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必然存在一个证伪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的“顿悟过程”。而这个“顿悟过程”，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已经充分地展示出了：首先，大跃进证伪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内含的关于只依靠所谓的先进的劳动阶级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其次，人民公社则证伪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内含的关于劳动大众必然欢迎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体制的思想；最后，文革证伪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内含的无产阶级能够一统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这样，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在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大领域里，都逐一被证伪，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逻辑”最后才可能在江泽民主席划时代地顿悟和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惊雷中，历史地消亡。所以，文革是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必然的环节。换言之，文革理所当然地是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必然。

文革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要功绩，是文革全面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有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用世界上最自私、最不平等、最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和手段，去谋求所谓的最公正、最平等、最善良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全面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内含有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的具体表现如下：

（1）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实际上代表了文革前中国宝塔式的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阶层，即“先进人民”阶层和“普通人民”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其中文革中较激进的左的群众组织代表“普通人民”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而较保守的右的群众组织则代表“先进人民”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应该说无论是较左的派别还是较右的派别，都是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和打倒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但是由于两派代表的阶层不同，有关解决文革提出的走资派问题的主张也不同：较左的派别主张按照群众在文革中的实际表现，重新界定中国社会的左、中、右阶级关系，即所谓“彻底砸烂”旧体制和阶级关系“大翻个儿”的

政治主张；较右的派别为了保持自己文革前较优越的社会地位，主张在基本上维持文革前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大前提下，用“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解决党内走资派的问题。显然，较左的派别的文革主张，更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在逻辑，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公开赞誉，毛公开赞誉群众中较左的派别的文革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试图通过群众运动让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阶级斗争逻辑，成为中国广大老百姓习惯和道德的标准；而较右派别的文革主张，则似乎更符合中国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本能和愿望，更符合长期以来老百姓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主张的自发的理解，因此这种主张在骨子里不倾向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阶级斗争逻辑作为老百姓习惯和道德的标准，而倾向于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或“为人民服务”作为老百姓习惯和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毛泽东公开批判。由此可见，文革中两派群众始终貌合神离无法真正地联合起来的问题，不是群众人为的素质问题。文革群众两派始终不能真正联合的根本原因，是文革前中国社会内部的“先进人民”阶层与“普通人民”阶层的矛盾，远没有发展到毛泽东主席文革理论所描述的敌我矛盾的那种尖锐的程度，甚至无产阶级当权派与走资派之间的矛盾也远没有发展到敌我矛盾的那种尖锐的程度，所以这些矛盾无疑不可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逻辑）彻底解决之。这意味着，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所谓的“反修防修”的问题，必然导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人为的激化和升级，因而也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基础的不断破坏和摧毁，显然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不可克服悖论的一个重大表现。

（2）文革的主要手段或形式就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所谓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民主。实际上，民主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东西，民主永远与法制对立统一，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民主是与毛泽东主席手中的军权及其相关的制度对立统一的；同时，由于民主与法制的本质上是体现社会阶级结构相互制衡的水平的工具或标尺，因此一个社会民主与法制发展的水平如何，本质上不决定于这个社会形式上采用何种制度，舆论上如何鼓吹民主，而在于这个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之间制衡的水平达到何种程度。所以，由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本身是一元化的宝塔式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本质上是严重失稳和单向控制与依赖的结构，而不是像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那样是诸阶级通过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去共同适应社会外在环境的稳定的结构，因此在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基础上完全按照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展开的大民主，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集中意志的奴隶或工具，这种民主至少从理论上讲不是全民的大民主，而是绝对倾向于单一的无产阶级的小民主。正因为如此，文革大民主只能沿着无产阶级专政内在的“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一方吃掉或消灭另一方”的逻辑，将两派之间的斗争不断激化和无限上纲，直至最后企图依靠武斗和暴力将对方铲除和消灭为止。所以，文革大民主，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手段开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异化”和“癌变”为群众相互残杀的工具，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文革的指导思想的来源——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不可克服的悖论的缘故。

（3）传统马克思主义内含不可克服的悖论问题最后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控制文化大革命的总体方略上：一方面在理论上毛由衷地依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肯定红卫兵激进派“彻底砸烂”十七年来共产党建立的体制的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毛又为了保住可能被文革彻底推倒共产党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底，只能被迫接受文革失败的事实，最后违心地用无产阶级专政铁的手腕将红卫兵激进派捏得粉碎。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文革领袖和文革群众，事实上都是不自觉地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在不可克服的悖论，锁死在必然惨败的泥潭里的；所以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文革领袖和文革群众，就像大型机械粉碎机里永远在相互拼砸的大小“铁块”，自觉或不自觉地最终只能砸烂对立面的同时也砸烂自己，而不可能建设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一句话，文革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 （四）文革是中华民族渴望崛起的必然

按照“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毛泽东和中国九亿民众，仅仅只是文革的载体。文革载体的素质，原则上不影响文革的政治实质和历史价值，而只是影响文革的政治实质和历史价值展示的速度、质量和水平。应该注意，文革的载体及其素质，在文革历史中不是纯个人或偶然的東西，他们之所以在文革中能够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有三个：第一，他们是文革前中国革命必然产物；第二，他们适应建国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宝塔式的阶级和阶层结构；第三，他们的言论和实践与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即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内含的逻辑兼容。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素质，包括他集中国法家帝王之大成之治国术在内，都是发动文革和展示文革实质的绝妙和高效的领袖载体，同样中国九亿民众万众一心响应毛的号召参加文革和统一地按照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逻辑的理解进行自己的文革实践的历史事实，也说明现代的中国老百姓也是展示文革实质的绝妙和高效的民众载体。而领袖和群众双方都是文革绝妙和高效的载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众万众一心试图通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让自己的共和国在世界历史上万年牢，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渴望崛起的必然。

#### （五）文革是展示知识阶级现代地位的必然

历史证明，在两极冷战的后期，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事实上已经在西方普及，因此当时的西方社会事实上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主政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而属于知识阶级主政的阶级合作的福利社会。这意味着人类社会总体上已经划时代地开始了由财产阶级主政的社会向知识阶级主政的社会过渡，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过渡。

在中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东方，虽然由于证伪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结构逻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需要，无产阶级仍然暂时占据着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主政地位，但是由于在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东方知识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空前强大和空前富有创造力的阶级。所以，文化大革命不自觉地用震惊全球的方式，展示了现代中国的知识阶级空前强大的历史地位，考验和锤炼他们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展示现代知识阶级现代地位的必然：

（1）文革不仅直观地证明知识阶级是相对资产阶级和工农阶级独立的阶级，而且也直观地证明在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生产力的中国现代社会，知识阶级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了足以动乱甚至推倒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的水平。

（2）文化大革命证明，中国的现代知识阶级在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历史作用，是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关于这一点在首都高校的红卫兵运动中，特别是在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原则上就是按照清华大学文革两派大争论所揭示的脉络展开的。应该说文革中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两派，即团派和4 1 4派，都是在毛泽东文革思想总框架下对立统一的两个知识阶级派别，但是这两个知识阶级派别对证伪毛泽东文革思想的作用是不同的。团派是从正面支持和强化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派别，表现为团派明确地提出对建国十七年来的体制必须“彻底砸烂”；而4 1 4派作为红卫兵运动地地道道的反对派，则是从反面向毛泽东文革思想提出重大质疑，具体表现为我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中表述的“4 1 4思潮”。“4 1 4思潮”的实质，正如毛泽东在文革中亲自公开批判它的那样，是“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

坐天下”，这正是文革不自觉地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结论。

（3）文革在中国第一次将知识阶级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即知识分子两派斗争的政治生活方式，搬出了宫廷，直接面向整个社会所有的阶级和成员。如果将文革中知识分子两派斗争与文革前的反右斗争和文革后的民运联系起来，人们不难发现，建国后大陆境内所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主要是以知识阶级内部的两派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中知识分子的一派是以共产党内的主流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另一派则是以在野知识精英为代表的非主流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或自由派。这种规律性的现象无疑提示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决不是只能依附在其他阶级的“皮”上的“毛”，他们从来就是以对立统一的两派斗争的方式适应社会政治生活和为社会服务的相对独立的阶级。

（4）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对文革失败的痛定思痛，发现文革中知识阶级内部的两派斗争，与自古以来中国古代儒法斗争，存在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其中，法家思想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清华大学文革中的团派思潮的先驱，其哲学要领就是用一社会群体依靠暴力和权力吃掉或战胜另一个社会群体的方略统治社会；而儒家思想则可以说是“统一论哲学”和清华大学文革中的414思潮的先驱，其哲学要领就是古代佛祖和孔子思想内含两元论哲学思想，即让社会群体各安天命、各得其所、相互制衡、相互合作去共同谋求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所以，通过文革，中国知识分子也找到了自己的根，并由此出发去正确地继承和扬弃自己民族的悠久历史，从而更自主更自信地面向自己的未来。

（5）文革雄辩地证明，文革大民主不可能是知识阶级未来主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的方法，因为文革的大民主，只能沿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演变为唯意志主义和唯暴力主义，其最终结果只能让知识阶级的两大派两败俱伤，同时也动乱和破坏整个社会。所以文革大民主的失败，无疑逼迫知识阶级彻底跳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局的高度去重新探索和思考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的方法。历史果然如此，通过文革发动后四十年的锤炼和积累，在1997年后，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或代表，正是通过对文革失败的痛定思痛，在总结知识阶级自古以来参政的大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现和创生了“统一论哲学”与“阶级合作理论”，从而彻底跳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为知识阶级的未来，也为全人类的未来，找到了人类社会诸阶级相互制衡，和平共建和谐世界的正确道路。同时，中共中央也终于提出了知识阶级主政的完整的治国方略，这个治国方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路线，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

#### （六）文革是人类历史必然的试错环节

综上所述，文革不仅是国际共运的最后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社会通过两极冷战证伪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的环节，甚至是人类社会由财产阶级主政的“阶级统治社会”进变为知识阶级主政的“阶级制衡社会”的最后的环节。反过来讲，继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如果不通过文革彻底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彻底揭示国际共运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不合理性，那么非但中国不可能迅速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误区，通过改革开放顺利向现代理想的“瑞典模式”和谐社会演变，甚至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也不可能迅速认识现代理想的“瑞典模式”和谐社会是与资本原始积累社会本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社会，从而迅速走出两极冷战的历史误区。由于“统一论哲学”揭示的“宇宙有序发展规律”，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永远是一部有序发展的试错史，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唯一的方式，是不断地依靠试错（创新）实践，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所以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决不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的重复先人旧错误的浩劫，而是现代人类迎接现代理想的和谐社会必然的试错环节！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